

爷爷李东山的爱国情怀

李志传



李东山像

我的爷爷李东山，是近代著名民族实业家，中国钟表制造工业创始人。我的祖籍是威海西南村，曾祖父名讳李昇，在村里务农；曾祖母马氏，是位杂技艺人。爷爷本名李秀桐，很多史料都称李树桐，这是不正确的。爷爷是“秀”字辈，东山是爷爷的字。爷爷兄弟四个，爷爷排行老三。爷爷共有三房媳妇，大房是童养媳，叫立秋，五岁来到李家。二房姓邝名玛丽，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，是广东人，但网上误传是英国人。三房是烟台珠玑村的大家闺秀。爷爷共有两个儿子四个女儿，长子李继华（字典章）是继子，他有六个儿子二个女儿；次子李继民，他有一个儿子二个女儿。我是李典章的第五个儿子，是爷爷的第五孙。

当年我们家在如今的朝阳街上，是一座二进的四合院，后院正房是二层楼，是中西合璧的建筑，大院门是双扇铁质门，并安装了自动关门装置，这在当时比较先进了。可惜，这所宅子在早些年的城区改造中被拆除了。从我们家出来就是德顺兴造钟厂，有关爷爷造钟的事情，大多是父亲和哥哥讲给我听的。

1915年，爷爷创办了宝时造钟厂。爷爷当年萌发造钟之意的原因有三个：

一是造钟有利可图。当时国内销售的都是德国“双箭”牌和日本“马球”牌时钟，爷爷的五金店销售这些钟，从中了解到利润惊人。

二是消费市场巨大。当时能买得起钟的都是富贵人家，平民百姓买不起，若是能把售价降下来，寻常百姓家都能买得起钟，市场潜力巨大。

三是实业救国的抱负。1912年孙中山莅临烟台，以张裕为例倡导实业兴邦，爷爷当时在现场深受触动，思想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。他认识到造钟不仅仅为的是个人利益，而是抵制外邦经济侵略、实业救国、利国利民的民族大业。

从1918年“寶”字钟问世到1945年烟台解放这个时期，爷爷始终坚定“利国利民”的信念，利用各种宣传形式，各种营销手段，通过提高产品质量、降低售价等方式，最终将日本钟挤出国内市场。爷爷这种“实业救国”的精神和“民族大义”的家国情怀，一直是我们李氏家族心中的丰碑，也是烟台钟表传承百年的文化精髓。

爷爷另一个可敬之处是“胸怀伟业，顾全大局”。爷爷的事业成功，合作伙伴唐功成可谓功不可没。翻阅历史上对唐功成的简介，说他当时是一位摆地摊的修伞匠，这是不准确的。听父亲讲，当时烟台已经开埠多年，很多工厂使用机器生产，唐功成是烟台有名的修理马达及电器的工匠。当时爷爷提出开办造钟厂的想法，二人一拍即合。唐功成建议购买当时最先进的德国设备，于是爷爷出资，唐功成担任厂长兼技师，创办了宝时造钟工厂，使用机器造钟，改写了中国手工造钟的历史。工厂实行了规范化的工业化管理体系，培养出中国一批精密仪器制造人才，为中国钟表工业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。可能爷爷他们当时做梦也不会想到，烟台会成为中国近代钟表的发源地，更不会想到经过百年的传承与发展，如今烟台已成为“中国钟表名城”。赞叹爷爷的雄心壮志之时，不能不敬佩唐功成爷爷对烟台钟表事业的奉献。

在宝时造钟厂取得成功之后，许多人看到了商机，纷纷投资制钟业，宝时造钟厂的技术人员也纷纷跳槽，爷爷不但不阻拦他们出去发展，反而还提供了帮助，父亲李典章对此不理解。爷爷对他说：“大家都出去办厂是好事，造的钟多了，价格下来了，小日本

的钟就没有人买了，咱中国人的钱不能让日本人挣。”

这种朴素的民族主义精神难能可贵。于是，烟台的许多有识之士和技术人才，相继在烟台乃至全国各地开办制钟企业。我知道的在烟台有七八家，外地的有天津北洋造钟厂、青岛时辰造钟厂、沈阳新明造钟厂、丹东大陆造钟厂、上海众中造钟厂、北京长城造钟厂、天津华威造钟厂，乌鲁木齐还有一家，名字记不得了。爷爷的二太太会英语，有文化，是爷爷事业上的得力助手。看到许多技术人才纷纷到各地办厂，爷爷开玩笑说：“德顺兴成‘黄埔军校’了！”二奶奶说：“黄埔军校培养的军队人才是保家卫国，你培养的工业人才是爱国兴邦。”这句话多么有哲理啊！

1945年，我爷爷让父亲“把厂子往南迁”，于是我父亲李典章和二哥李志政，与技师唐志成、唐绍相父子一同去上海兴办了时民造钟厂。时民造钟厂是收购的众中造钟厂，主要生产闹钟，沿用的是“众中”商标，这个厂我们家族是大股东。接着，又先后参股开办了亨达利钟厂和时光钟厂。亨达利钟厂是与亨达利钟表店合办的，时光钟厂是与大光明钟表店合办的，二哥李志政同时担任三个厂的厂长。后来天津北洋钟表厂倒闭，二哥买下来生产“铁锚”牌时钟。

1956年实行公私合营，我父亲和二哥离开时民钟厂，父亲回家养病，后来二哥李志政去杭州开办西湖钟厂。烟台钟表的技术人才将当时先进的制钟技术传播到全国各地，形成了中国钟表工业体系，推动了民族工业的发展，后人称爷爷李东山是近代钟表工业创始人，他当之无愧。

三

爷爷在烟台开办的企业还有锦章照相馆、德顺兴百货大楼、同志料器厂、瑞兴伞厂、升达花炮厂、金城大戏院、东莱烧锅酒厂、爽身粉厂、鞋粉厂、司的克厂（生产手杖）。爷爷还入股了生明电灯公司、水产公司，上海荣氏“五燕牌”面粉公司、天津东亚毛纺厂等企业。

爷爷对于钟表生产尤其重视，先后到德国和日本学习钟表制作技艺和企业管理，接受了西方的文明，工厂管理制度严格。他在车间四个方位的天窗上各安装一片镜子，坐在二楼办公室就可以观察到车间的生产状况，逢年过节给劳动积极性高、贡献大的工人发赏钱，赏钱数目是不公开的。爷爷十分重视节约材料，有一次到车间，看到组装工序地上散落了很多M3螺丝，他不声不响地蹲下身子，一颗一颗捡起来放回工作台上，工人们面面相觑，做好了挨训斥的准备，哪知爷爷却一声不吭地转身离去，从此以后地上再也没有散落的零件。

爷爷做事比较开明，造钟厂的伙食比其他人办的厂子都好，很多人都愿意来宝时造钟厂做工。爷爷说过：“东家赚的一分一厘，都是工人干的，对工人不好，是自断后

路。”听父亲说，爷爷每年都给烟台的慈善机构——广恤堂捐款。

爷爷爱憎分明，对日本侵略者恨之入骨，对共产党和政府忠贞不渝。日寇侵占烟台后，日伪政府官员几次出面邀请李东山出任总商会会长，爷爷均以有病为由拒绝。日寇1938年2月3日侵占烟台，爷爷当月将金城电影院改名为中华电影院，以此表达爱国之心。烟台1945年第一次解放后，我爷爷积极组织员工参加了庆祝烟台解放的游行活动，还同我父亲李典章一同到市政府拜见首任市长于谷莺。于市长是我父亲的同班同学，读书的时候叫于书林，参加革命后改了名字。爷爷向于市长请教共产党对工商业的政策，并表示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，尽快恢复钟厂的生产，为解放战争出力。于市长非常关心德顺兴造钟厂当时困境，表示政府即将抽调资金支援，希望尽快恢复生产。

1946年春夏之交，周恩来副主席在延安写信给中共烟台市委，要求烟台组织生产一批优质时钟，作为宋庆龄先生赠送给外国友人的礼品。烟台市委将这一任务安排给德顺兴造钟厂，工厂圆满完成了任务。

四

爷爷为民族工业所做的贡献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认可，1950年，第一届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代表大会筹备召开，中央统战部发公函邀请李东山先生参加。殊不知爷爷已于五年前去世，烟台市政府发函上报中央将派代表参加会议。我的二哥李志政在《我的爷爷李东山》一文中说是“李东山先生大夫人出席代表大会”是不准确的。爷爷一生的三房太太，大房是童养媳，我们称之为“小脚奶奶”；二房没有裹脚，我们叫她“大脚奶奶”；三房是烟台珠玑村的一个大户人家小姐，人长得胖，我们叫她“胖奶奶”。政府想叫“小脚奶奶”当代表，“小脚奶奶”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传统女人，打怵去北京参会，只好选派爷爷的四弟媳妇王广智代表爷爷出席了会议。她回来后，还在烟台作了报告。参加首届全国工商联大会是我们李氏家族的荣幸，也是烟台的骄傲。

欣闻烟台钟表制作技艺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作为李氏家族成员我深感荣幸。从烟台钟表艺术博物馆

和李东山纪念馆的藏品、展品不难看出，美时嘉作为非遗保护单位，为烟台钟表传承做了大量具有历史价值的工作，通过馆藏大量古钟文物和历史资料，将百年的烟钟技艺、烟钟文化固定保留下来，并通过传承、发展和创新，塑造了符合时代审美的烟台钟表新形象，在此，我代表李东山后人对美时嘉表示深深敬意。

我的爷爷李东山创造了烟钟，我的父亲一辈子造钟，我的二哥李志政，二姐李志琴也都是从事钟表事业，我及下一代虽然没有参与制钟工作，但是我们一直为烟钟的文化传承贡献力量。前几年，中央电视台以烟台钟为题采访了我，采访视频在CCTV-9纪录频道播出。如今开馆的“李东山纪念馆”以及“北极星博物馆”中的许多历史资料和文物是我们家族成员提供或捐赠的，能为烟台钟表的传承和发展做出贡献，是李东山后人义不容辞的责任，也是告慰先祖最好的表达方式。

